

人口红利概念及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再认识^{*}

——聚焦于人口机会的分析

原 新 高 瑗 李竞博

【摘 要】人口红利是建立在人口机会窗口上的经济学概念。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机会,充分必要条件是人口机会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人口红利有数量型和质量型之分,前者以人力资源优势为基础,后者以人力资本为基础,二者的周期必有重叠,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潜力更大且更具可持续性。依据人口发展规律,21 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高台期相伴,劳动力资源存量虽减但规模庞大,人口抚养比相对较低,人口综合素质有了质的飞跃,低龄老年人力资源规模巨大且质量改善,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窗口越关越小,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窗口越开越大,两个机会窗口重叠并正加速从数量型红利向质量型红利转变。与此同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实施健康中国等新时代新发展战略布局,初步奠定了继续收获新人口红利和再创经济辉煌的政策基础。

【关键词】人口机会窗口 人口红利 数量型红利 质量型红利 经济社会政策

【作 者】原 新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高 瑗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李竞博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21 世纪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常态社会现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正在改变国家发展的人口基础,这是人口发展的规律性结果。2015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 1.32 亿,人口老龄化水平为 9.7%。根据预测^①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编号:13JZD0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国内人口或老龄工作行政部门、人口或老龄研究机构及相关的研究项目和学者,对中国人口和老龄化趋势进行了大量的预测,虽然结果有所差异,但是大趋势一致。本文除特别说明外,人口预测数据均采用联合国 2017 年最新版本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 的中方案数据。

(UN, 2017), 2050年, 老年人口规模将增至3.59亿, 比当前规模扩大1.72倍, 相应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升至26.3%, 届时中国将跨入世界高水平老龄化国家的行列, 加速的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形势的核心特征之一。与此同时,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不可避免地步入下降通道, 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新常态。因此, 一个时期以来,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问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备受关注的议题。根据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检索, 在2003年1月至2017年9月期间, 主题包含“人口红利”字段的发表论文总计5 051篇, 题目含有“人口红利”的论文为1 404篇, 可谓浩瀚。专注于人口红利的研究本身是一件好事, 然而, 在研读文献的过程中却发现, 人口红利概念混乱, 无限夸大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把人口红利作为经济活力的判断标准, 甚至有人口决定论的苗头, 还有把人口红利标签化和口号化的现象。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因素。基于21世纪上半叶快速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国情, 本文旨在梳理人口红利概念的本源, 澄清中国人口红利研究的误区, 从人口发展规律的视角, 聚焦于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变化, 讨论中国继续收获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的存续, 并结合新时代新发展模式, 分析判断人口红利在此背景下可持续获取的途径。

一、国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研究人口红利始于21世纪初期, 多数研究以劳动力资源增量和存量增减趋势作为分析的基点。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 学者们对人口红利的基本要素及实现条件基本达成了一致的观点, 但对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的分歧较大。

(一) 无争议的人口红利认识

人口红利包含两大基本要素: 一是劳动力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较大; 二是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王颖等, 2010; 钟水映、李魁, 2009; 陆旸、蔡昉, 2016)。人口转型过程中, 中期人口转变阶段向后人口转变阶段的过渡时期, 虽然人口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 但首先表现为“中间大, 两头小”的形态, 即劳动力供给充沛,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巨大, 总抚养负担比较轻, 中国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为人口机会窗口。

人口机会窗口开启并不意味着必然存在人口红利, 二者之间并不具有等价关系(刘元春、孙立, 2009)。只有当经济社会条件配合人口机会窗口开启, 才能将潜在人口机会转变为现实的经济红利。

首先, 制度保障。人口机会窗口集聚生产潜能, 经济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是基本前提(王丰、Mason, 2006; 都阳, 2013)。只有当社会发展政策和措施, 如教育、就业、收入分

配、投资、生产、消费、进出口改革等,与人口机会窗口相互匹配,才能够把潜在的人口机会转变为现实的经济红利,反之,则会丧失人口机会,错过发展良机(原新、高瑗,2017)。

其次,有效劳动力输入。在人口机会窗口提供充足劳动力数量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参与率,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陈卫,2007;梁颖、陈佳鹏,2013)。如果劳动参与率较低,就意味着大量劳动力剩余,失业劳动力应纳入被抚养人口,无疑会增大实际抚养比,降低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利于经济增长(侯东民,2011)。

第三,劳动力质量改善。在劳动力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劳动力健康状况和人力资本是劳动力素质的存量。劳动力健康状况低下,无疑会加重社会抚养负担,甚至残障比例较高时,有效劳动力输入受阻,在业劳动人口的抚养能力减弱,单位劳动力的有效社会输出降低,劳动生产率低下,从而挤压人口红利(叶文振,2007)。人口质量通过教育投资或培训的形式形成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就业结构改善等方面都能形成人口红利。

(二) 争议的人口红利消失论

在人口机会窗口存续阶段,人口年龄结构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动力因素,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计算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30%(王德文等,2004;车士义、郭琳,2011;王金营、杨磊,2010;原新、刘厚莲,2014;陈友华,2005),但均充分肯定了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贡献。

目前,中国已经完成人口转型,人口快速老龄化已然成为国家发展的人口基础。与此同时,国家经济进入新常态,年均经济增长目标值调整到6.5%上下,比已经实现的“中国经济奇迹”年均增长率低1/3左右,自然引发学者们的担忧,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下人口红利是否存续成为饱受争议的议题。

乐观人口红利论基于目前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认为中国仍存在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压缩劳动力绝对规模是事实,但并不构成劳动力短缺。2008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劳动年龄人口非自愿性和自愿性失业现象加剧,城市劳动力市场出现选择性用工,剩余劳动力背景下的“就业难”只是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乃区域性、阶段性现象(穆光宗,2008),劳动力总量并不稀缺。未来1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真正的劳动力短缺,至少到2020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会持续扩大(侯东民,2011)。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约到21世纪30年代关闭,前后经历约40年,2010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长收获人口红利最丰厚的年代(于学军,2003;陈友华,2005;穆光宗,2008;刘士杰、原新,2011;杨成钢、闫东东,2017)。

悲观人口红利论基于目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和人口抚养比上升,不利于正向经济增长的判定,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出现在2010年,累进式人口盈利

在 2010 年左右消失(都阳,2010;王伟同,2012;王德文等,2004;蔡昉,2007;世界银行,2007)。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的额外优势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蔡昉,2004)。劳动力数量是人口红利的基础要素之一,2015 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的转折期,劳动力数量达到峰值,此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所带来的劳动力数量下降,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债阶段(王德文等,2004)。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导致有效劳动力规模萎缩,年龄结构的生 产效应降低,人口红利减弱直至消失。

(三) 对人口红利研究的评述

第一,中国是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典范。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瞄准劳动力资源巨大且不断扩张的人口机会,开放国门,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基础建设,加大出口,打造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成就了世界加工厂的经济模式,旨在创造尽量多的就业岗位,最大限度吸纳劳动力就业,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制造和创造财富,由此促成了长达 30 多年 GDP 年均增长率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繁荣昌盛,人民分享发展成果,递次摆脱贫困落后,全面解决温饱,即将实现全面小康,人人走向共同富裕,成功把劳动力数量优势的人口机会转化为经济红利。这是大家的共识。

第二,不能简单以劳动力数量判断人口红利存续与否。伴随低生育率水平长期稳定,人口机会窗口逐渐关小是客观规律,但不能由此判断人口红利一定消失。一方面,人口机会窗口只反映人口结构的数量关系,并未包括至关重要的人口质量因素。就人口机会向人口红利转变的必备条件,劳动力数量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另一方面,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虽有关联,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前者是人口发展阶段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期,是人口学概念;后者是配合恰当的经济社会政策所实现的经济利益,是经济学概念,绝对不能用人口机会存续与否代替人口红利是否存在。这是国内研究中最常出现的问题。

第三,在快速人口老龄化时代已经到来的背景下担忧人口红利是必然的,但是切忌一叶障目。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红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曾经历了 1949~1958 年、1962~1975 年、1981~1994 年 3 次生育高峰,遵从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时序上,某个出生队列在成为老年人口之前首先是劳动力人口,21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会递次呈现 3 次劳动力冲击波和老年人口冲击波;截面上,某个时点的劳动力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关系是不同出生队列人口数量关系的静态反映,当第一次生育高峰人口步入老龄时,第二次和第三次生育高峰人口依然处在劳动年龄阶段;性质上,虽然劳动力人口的主体是生产性人口,但老年人口并非绝对的消费性人口,也具有生产性特征,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口,可以继续贡献。21 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是事

实,劳动力资源规模巨大且质量改善也是事实。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红利不能混为一谈,人口老龄化固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但不能用对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淹没劳动力资源庞大且素质不断提升的事实。劳动力短缺说的人口学基础并不成立,反倒是劳动力就业压力长期存在。目前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讨论,定义为人口数量机会窗口的削弱更加准确,事实上,无论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差距,还是结构性就业和失业,都对人口红利消失说的基本论据提出挑战。

二、人口红利概念的本源

重温人口红利学说创建者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国的人口红利。1997年,Bloom与Williamson提出了人口红利概念,他们认为,由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所导致的人口增长速度和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出现高度相关(Bloom等,1997、2003)。在人口转变中段的前期,死亡率超前于生育率率先下降,由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少年儿童存活率大幅度提高;人口转变中段的后期,死亡率稳定在较低水平,生育率开始下降,出生人口缩减,人口增长速度由快而慢,而人口转变中段前期阶段的少年儿童出生队列正好步入劳动年龄。这个时期,少儿人口数量和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缓慢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增大,总抚养负担较轻,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潜在机会,被称之为“人口大礼”(Demographic Gift),2002年更改为“人口窗口”(Demographic Window)和“机会窗口”(Window of Opportunity)。同时,他们构建分析框架和模型,实证探讨了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经济奇迹,提出由人口转型所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超过被抚养人口增速,从而提高了东亚经济体的人均生产能力,为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年龄结构基础条件,配合正确的社会、经济、政治决策和制度,将潜在的经济增长机会转变为现实,成功收获人口红利。1965~1990年,人口动态变化对东亚人均GDP年增长速度贡献率一直保持在1.4~1.9个百分点,即东亚经济奇迹约有1/3是由人口红利贡献的。

Lee等(2006)对人口红利进行了细化,提出了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他们充分肯定了Bloom等人提出的建立在人口转型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解释,并把它定义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又提出,随着生育率持续走低,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终将被削弱,以低死亡率和低生育率为特征的后人口转变阶段,伴随着人口转变过程中后期阶段的劳动力人口步入老年,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有效劳动力减少,人均收入减少,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由正转负。与此同时,由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带来的潜力巨大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老年人力资本和储蓄的积累或将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导致第一次人口红利结束的老年人口力量会引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Mason, 2005; Lee 等, 2006)。第二次人口红利一般开始于人口转变结束之时并延伸到后人口转变阶段,但是,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经济社会政策最好建立在前一个阶段,应超前谋划。

同时, Lee 等(2006)明确提出,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周期一般会维持 50 年甚至更长。但是,相对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收益是短暂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潜力更加巨大且具有可持续性。人口红利有先后顺序,第一次红利首先开始并结束,第二次红利晚些时候开始且有可能无限期延续,两次人口红利周期必有所重叠。Lee(2006)实证分析得出,1970~2000 年,除撒哈拉非洲外的全球其他地区的两次人口红利的收获均是正向的,而且发达国家第二次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大于第一次人口红利。

创立人口红利学说的学者们还有一个共识,人口转型所创造的“人口大礼”或“人口窗口”,只是提供了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条件,它只是潜在的经济增长机会,无论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人口红利,其收益都不可能自动收获。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时期,人口机会能否转变为现实的经济红利,依赖于有效的经济社会决策,取决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而非人口本身。

西方人口学者的研究是基于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人口转型过程并获得两次人口红利的分析,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有明显的时间特征和衰退期,第二次人口红利没有明显的时间界定,潜力巨大且可持续。由于发达国家观察到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发生在人口老龄化之后,认为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等是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结论,即人口质量红利。

本文认可第二次人口红利存在的判断,但并不赞同人口老龄化驱动、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要素推动第二次人口红利并可以永续的观点。一方面,第一次人口红利因为劳动力规模大且抚养负担低,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推力,但是,由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毕竟具有周期性和时效性,终将消逝。另一方面,在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阶段,全民的健康和教育水平都同步得到了长足进步,人力资本大幅提升,人口质量大为改善,在人口数量红利减弱甚至消退之后,人口红利的基础从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形式,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继续并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当然,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开发也是继续收获人口红利的动力之一,但绝非主要动力。简言之,人口红利作为一种发展要素,在发展过程中由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必然趋势。

三、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犹存

参考西方学者的人口红利学说,再来考察中国的人口发展特征,从人口学视域判

断,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点并不支持人口红利消失论。至少到 21 世纪中叶,人口转型的基本特征都足以提供可供利用的劳动力资源,人口结构都足以经济增长提供源动力,中国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潜在机会依然存在,同时,人口综合素质大为改观,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基础正在形成。

(一) 社会抚养负担依然较低

人口年龄结构处于抚养比较低的阶段,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人口抚养比解释为单位劳动年龄人口抚养的 0~14 岁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和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之和。从生产环节看,少儿和老年人口均属于消费型人口,区别在于少年儿童基本不具有社会生产力,老年人虽已退出劳动力市场,仍具有生产价值,关键是开发利用。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口必然进入负债期。

不考虑人口结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以总抚养比 ≤ 50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100)为标准,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中方案判断(UN,2017),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在 1996 年开启,直至 2032 年关闭,历时 37 年(见图 1)。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之前,非生产性人口以少年儿童为主,蕴藏了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之后的丰富劳动力资源;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之后,非生产性人口以老年人为主。纵观历史,1965~2010 年的人口抚养负担持续下跌,紧随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中国于 1999 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10 年人口抚养比走到谷底 35.6,然后止跌转升。人口抚养比开始迅速上升并将于 2032 年突破 50,2050 年达到 67.5,同时伴随着快速人口老龄化,这成为人口红利悲观论的主要依据。

用总抚养比 ≤ 50 作为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与关闭的阈值只是人为规定的一个标准,它只能判断人口抚养负担轻重的相对程度,但并不能作为判断人口红利是否结束的绝对标准。现实中,总抚养比已经超过 50 的经济发达国家比比皆是,例如,2015 年,日本总抚养比为 64.0,法国 59.2,英国 55.5,德国 52.1,美国 51.2,他们依然保持经济强势。同样,判断人口机会窗口也可以采用其他标准,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UN,2004)提出,人口年龄中位数在 40 岁以下、0~14 岁占总人口比重小于 30%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低于 15%的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期。如果同时满足这 3 个条件,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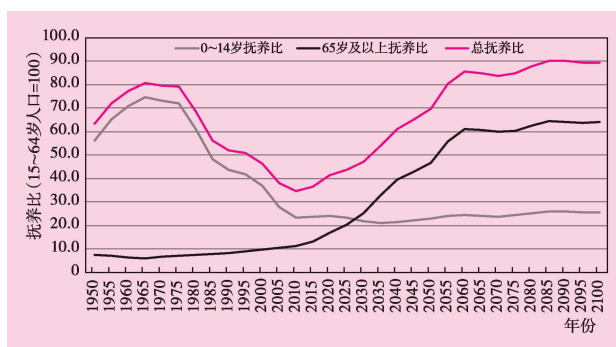


图 1 1950~2100 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变化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7),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中方案), <https://esa.un.org/unpd/wpp>。

的人口机会窗口期为1986~2024年。解析联合国的指标会发现,如果不考虑年龄中位数,满足0~14岁人口比重小于30%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低于15%,换算成总抚养比,为81.8,这与总抚养比低于50的标准差距太大。事实上,人口机会窗口并非存在一个十分清晰的界限,人为规定与客观现实存在差距。

(二) 劳动力资源依然庞大

劳动力规模是收获人口红利的重要基础。在不考虑劳动参与率、结构性供给等因素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是潜在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当经济增长衍生出新的劳动力需求时,劳动年龄人口能否充足供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1.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

改革开放以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国家统计局,2016),1978年为5.62亿,1981年突破6亿,1986年超过7亿,1995年达到8亿,2002年超越9亿,2011年跨过10亿,2013年达到峰值10.06亿。虽然2013年至今,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由正转负,存量开始萎缩,但劳动力供给始终保持在10亿以上。

展望未来,21世纪上半叶,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深化的背景下,虽然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下降不可避免,但恰是劳动力资源供给的高台期(见图2),二者在时间上的重叠是中国快速人口转型的规律使然,有别于西方缓慢的人口转型。2020年以前劳动年龄人口依然在10亿以上,2038年保持在9亿以上,2050年还有8.15亿(UN,2017),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多45%(2.53亿)。假设中国保持经济新常态增长、TFP高贡献,考虑劳动产出弹性变化的可能,2030年劳动力需求规模为6.07亿~9.64亿(王金营、顾瑶,2011),这一规模需求远小于潜在劳动力供给。2035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存量加速下降,但是规模依然庞大,劳动力资源数量供给相对充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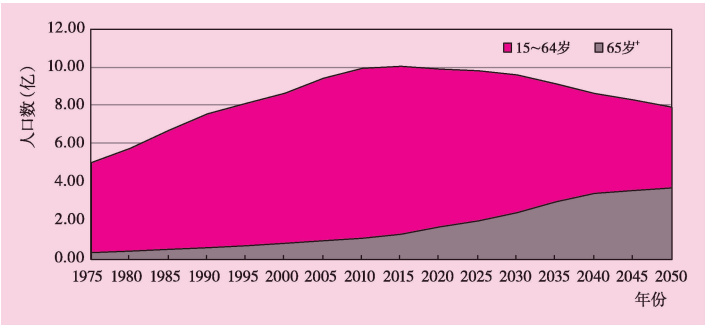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17),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7 Revision(中方案),<https://esa.un.org/unpd/wpp>。

2.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劳动力质量需求将部分替代数量需求

十八大以来,一再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去产能,提升产业结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技术、技能、服务、金融等密集型产业部分替代业已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大势所趋。未来

劳动力市场将弱化对劳动力数量需求,强化对劳动力质量需求,劳动力数量供给相对更加充足。同时,2015年《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实施制造业强国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确立了“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规划了迈入制造强国行列、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经济增长方式正在悄然向重视人力资本开发和提升劳动生产率转变。

总之,中国潜在的劳动力供给资源充沛,虽然规模萎缩,但不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反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城市劳动力集聚是劳动力资源供给对经济增长最大的挑战。

(三) 质量型人口红利基础坚实

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为要素驱动,劳动力资源优势不但创造了劳动密集型经济带来的高速增长,而且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在劳动力规模有限甚至出现萎缩的情况下,高质量的有效劳动力输入才能减轻社会抚养压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可持续经济发展提供续航的动力。

中国人口综合素质的普遍提升已经为迎接这种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人口健康素质改善显著。2016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5岁,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9.9/10万,婴儿死亡率降至7.5‰,居民的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二是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本存量愈加丰富。2015年末,受大学教育(含大专)人口1.71亿、高中(含中专)2.11亿、初中4.89亿;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2年(为高中阶段一年级);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3.3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目前,中国每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还在扩大,2016年,研究生招生66.7万人,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748.7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83.5万人。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中国制造2.0”正在向3.0、4.0时代迈进,更为先进的产业发展模式必将在21世纪的中国递次出现。人力资本是创新发展的引擎,是兴邦治国的能动要素,是民族和国家兴旺与发展的关键。人口健康素质改善,受教育年限的普遍提升,积累的巨量人力资本,成为进一步开发和收获人口质量型红利的基础。长远看,人力资本的存量已经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向第二次人口红利转移做好了准备,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已经开启。

(四)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挺进,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提升老年人的经济社会参与率已经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共识。

目前,中国实行的法定退休年龄源于20世纪50年代,男性60岁和女性50~55岁退休,明显偏低,与寿命延长和人口年龄结构新形势的矛盾凸显。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减轻养老金收支风险的措施,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17年,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出台,设定5年左右的缓冲期,逐渐将退休年龄从最高60岁延至65岁。延迟退休本质上是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释放和再利用。渐进式推迟退休,就是把60~64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变为大龄劳动力资源。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2020年60~64岁低龄老年人口总量为7668万人,2030年增至1.16亿,2050年为1.20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可供开发的劳动力财富。如果把退休年龄从60岁渐进式延迟至65岁,2015~2050年累计可增加约1亿劳动力数量,相应的,减少等量的老年人口数量(原新、史佳颖,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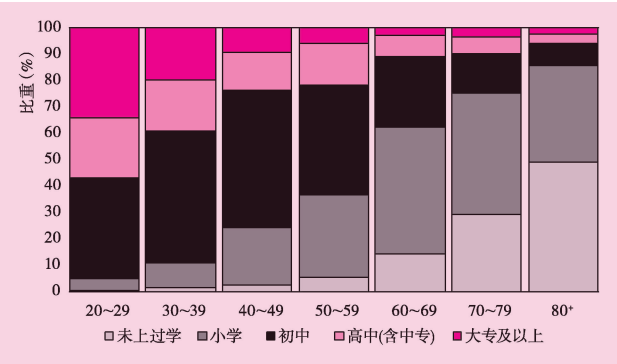


图3 2015年中国20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

低龄老年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除了规模大之外,对劳动力质量也是部分补充。2015年,60~69岁低龄老人中,有11.18%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明显优于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同一指标,在50~59岁的准老年组(2030~2039年进入老年)几乎翻了一番,为22.03%;在20~29岁年轻人群则高达56.99%(见图3)。未来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随老年人代际转换,老年人力资本开发的有效性也会随之提高。

从人口发展阶段分析,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机会是人口转型创造的丰富的人力资源,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基础是社会发展,尤其是教育进步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尽管人口老龄化是未来不可逆转的社会大背景,中国数量型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最大的时期已经过去,并在由大而小逐渐关闭的阶段;但是,质量型人口机会窗口正处在由小至大的开启阶段,人口发展阶段为继续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和开始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提供了机会,中国依然处在收获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再次抓住人口机会,再创经济社会发展奇迹,关键是正确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决策和战略。

四、结论与讨论

人口红利只是西方学者创立的一个学术概念和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分析框架,并不是判断国家经济活力的标准和尺子。借鉴这一概念和框架,既不能绝对化,也不能生搬

硬套,一定要结合中国国情本土化。虽然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在时间和发展方式上与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但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国家发展所起的作用是类同的。人口窗口是人口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机会,而人口老龄化也是不可逆转的常态现象,这无疑会对人口年龄结构的经济效应带来考验。

目前,中国潜在劳动力资源丰富,至少到 21 世纪中叶,劳动力数量资源尚不存在短缺的担忧,“中国经济奇迹”期间又积累了巨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伴随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可供利用的劳动力数量优势逐步向质量型转变,相对延长了人口机会窗口期,最大限度地创造了可收获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这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人口机会能否转变为经济红利,关键取决于与人口机会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这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充分必要条件。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人口红利是一个建立在人口机会窗口上的经济学概念。人口机会窗口是人口转型的客观后果,在不考虑经济社会因素的情况下,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人口年龄结构具有生产效应的机会,人口机会不会自动转变为经济红利,只有当经济社会措施与人口机会相匹配时,才能变人口机会为经济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实现的必要条件是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需要充分就业与经济改革等要素相匹配;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是发展教育与提升人力资本的同时,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等要素,配合恰当的经济、社会、政策环境。两次人口红利的转移,本质上是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的过渡。在发展中,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和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最终是人口质量所具备的新的红利形式。

第二,人口红利在创造“中国经济奇迹”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过去,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经济、市场因素与低抚养比人口年龄结构、低成本丰富劳动力人口因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历史性相遇,中国抓住了人口机会窗口,成功实现了人口机会向第一次人口红利的转变。展望未来,在中国经济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的过程中,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也已开放,关键是要配合适当的经济社会发展策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实施健康中国等战略,是收获新人口红利和再创经济辉煌的政策基础。

第三,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劳动力增量转负、规模萎缩是事实,但是,劳动力存量依然庞大也是事实,劳动力质量不断提升更是事实。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制造 3.0、4.0 时代的到来,劳动力质量需求部分替代数量需求是必然,继续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机会虽弱仍存;与此同时,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的人力资本储备雄厚,准备充分。中国数量型人口红利和质量型人口红利之间既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分界,也没有

严格的始末时点,重叠收获数量型红利和质量型红利的机会已然到来。当然,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难度加大,这主要受限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转型压力、人力资本能量释放存在困难、人口老龄化加剧、储蓄率降低等因素的影响。

第四,要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角度确定分析人口红利的视野。只有从发展的角度认识人口红利问题,才能正确认识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及其变化。人口红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然产生数量与质量的转换,并经过转换形成巨大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型,为人口红利的转型和延续提供了发展基础。传统人口学角度的人口数量红利,按照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进程自动消失,这是不需要讨论的必然后果。目前要重点关注的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人口转型过程中,如何顺利过渡和收获质量型红利,因为,质量型红利是更加巨大和更加持久的经济增长动力。

参考文献:

1. 蔡昉(2004):《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第2期。
2. 蔡昉(2007):《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第7期。
3. 车士义、郭琳(2011):《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人口研究》,第2期。
4. 陈卫(2007):《是人口红利? 还是人口问题? 》,《人口研究》,第2期。
5. 陈友华(2005):《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第6期。
6. 都阳(2010):《人口转变、劳动力市场转折与经济发展》,《国际经济评论》,第6期。
7. 都阳(2013):《中国人口红利可以挽救》,《人民论坛》,第7期。
8. 国务院办公厅(2017):《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2017年9月。
9. 侯东民(2011):《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人口研究》,第3期。
10. 梁颖、陈佳鹏(2013):《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比较的视角》,《人口学刊》,第4期。
11. 刘士杰、原新(2011):《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问题与政策》,《中州学刊》,第6期。
12. 刘元春、孙立(2009):《“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人口研究》,第1期。
13. 陆旸、蔡昉(2016):《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模拟》,《世界经济》,第1期。
14. 穆光宗(2008):《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15. 世界银行(2007):《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
16. 王德文等(2004):《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第5期。
17. 王丰等(2006):《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18. 王金营、杨磊(2010):《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人口学刊》,第5期。
19. 王金营、顾瑶(2011):《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兼对中国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认识和判断》,《人口学刊》,第3期。
20. 王颖等(2010):《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人口政策》,《人口研究》,第5期。

21. 王伟同(2012):《中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研究——兼论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财贸经济》,第11期。
22. 杨成钢、闫东东(2017):《质量、数量双重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红利经济效应变化趋势分析》,《人口学刊》,第5期。
23. 叶文振(2007):《不要用人口红利误导我国人口政策》,《人口与发展》,第4期。
24. 原新、高瑗(2017):《中国快速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河北学刊》,第4期。
25. 原新、刘厚莲(2014):《中国人口红利真的结束了吗?》,《人口与经济》,第6期。
26. 原新、史佳颖(2012):《退休年龄调整:为何如此纠结?——推迟退休有利于缓解老龄问题》,《人口研究》,第6期。
27. 于学军(2003):《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28. 钟水映、李魁(2009):《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人口与经济》,第2期。
29. Bloom, D.E., & Williamson, J.G. (1997),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Nber Working Papers, 12(3), 419-455.
30. Bloom, D.E., Canning, D., & Sevilla, J. (2003),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RAND Corporation.
31. Lee, R., & Mason, A. (2006), What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Finance & Development, 43.
32. Mason, A. (2005),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s i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hanging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s (pp.81-102). Mexico City, 31 August 2 September 2005.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33. United Nations(2004), World Population to 2300.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34. United Nations(2017), Wpp2017: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

(责任编辑:朱 犁)

编辑部声明

为适应中国信息化建设的需要,扩大作者学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台湾中文电子期刊服务资料库——思博网(CEPS)全文收录。作者投稿文章一经录用,电子版、网络版版权均归本刊所有,作者著作权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上网,请在来稿时注明,本刊将进行适当处理。欢迎登录<http://www.zgrrkx.com>、<http://zkrk.chinajournal.net.cn>、<http://www.ceps.com.tw> 查阅本刊。